

第一章 家庭和早年生活

中国进入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时候，全国农村普遍动乱不安。对英鸦片战（1839—1842）遭受失败的创伤还在医治，新的灾难又接踵而来：和英、法武装冲突（1856—1860），北京被英法联军占领；太平天国起义（1850—1865），富饶繁荣的长江三角洲大部分都遭到破坏。捻军和回民在西南、西北的起义，持续了十多年。列强威胁着要瓜分中华帝国，而内部骚乱又反映出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和革命热情的复活。软弱、年幼的皇帝们相继登位、野心勃勃的朝廷官吏们又互相阴谋倾轧。到了十九世纪末，外国侵略和国内起义更加频繁起来，显然，清王朝已经注定快要灭亡了。

正是这个时期，在太平天国失败大约 20 年之后的 1884 年 9 月 28 日，中国诗人苏曼殊，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日本横滨诞生了。这个孩子的父亲苏朝英（苏杰生），像许多广东同乡一样，是到日本经商的。他在横

滨英商万隆茶行当买办，在当地华侨社会中境况很好。曼殊出生时，他正四十岁，在横滨的家属中，有一个日本妾河合仙，亲昵的称呼叫河仙，三十六岁；还有一个中国妾大陈氏，十七岁。他三十七岁的妻子黄氏，及河合氏所生的长子，十岁的煦亭，都住在广东老家。从 1886 年到 1889 年间，黄氏曾到横滨和他住在一起。两年以后，又有另一个广东女人小陈氏被带到日本，做他的第二个中国妾。

在苏杰生临时安家的日本，从 1868 年开始全力进行明治维新。在东京建立了新首都后，横滨随即在 1872 年由日本的第一条铁路和东京连接起来，并以新从国外引进的轮船和外部世界相沟通。它成为这个国家的主要港口和商业中心，担负起比以往更重要的作用。在同一时期中，明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例如废除封建制度，制定刑法，修改和西方国家的条约，以及在 1889 年宣布日本新宪法等。总而言之，促进日本成为世界强国的现代化进程，和海洋对岸中华帝国的因循守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主要由像苏杰生这样的商人组成的日本华人社会，对赚钱和养家，远比对政治和国际形势更感兴趣。直到 1895 年第一批中国学生到达日本时，才在他们的这些同胞中间播下了革命种子。

苏氏家族，居住在广东省香山县沥溪乡一个大约有一百户人家的村子里。香山中最有进取心的不仅移居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而且还到更远的夏威夷和美国去冒险。在苏曼殊出生前几年，也是香山人的孙中山(1866—1925)，离开家乡到夏威夷去寻求新的生活。他在那里接受了西方教育。和外国人的早期接触，在青年孙中山和其他香山人中唤起了民族主义意识和革命热情。

苏曼殊的祖父苏瑞文是最早去国外营业的一个广东商人，退休之后和许多儿孙住在家乡。就是他创办了这个家庭和日本之间的进出口贸易。他和国外的关系，帮助他的长子苏杰生在横滨经营茶叶生意。苏杰生继承他父亲的事业，往返于香山和横滨之间。早在1873年他就娶了河合仙为妾。两年后她生下了苏杰生的第一个儿子苏煦亭。在1877年至1879年间，她住在香山的苏氏老家，大概是因为苏家头生的男孩煦亭的抚养，促使她在香山暂住，从而在一个传统的家庭里直接学到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苏曼殊成年以后，终身都痛苦地哀叹他的身世有“难言之恫”。有一个时期，人们曾经相信曼殊是纯日本血统，是一个日本人和河合氏生的儿子，她在丈夫死后带着曼殊到了杰生家里。可是，这已经证明是无稽

之谈。曼殊出生时，和杰生同在横滨、关系最接近的苏家主要成员大陈氏，已经驳倒了这种说法。当曼殊的血统在父亲这方面已经确定无疑的时候，对他母亲是谁，却又发生了问题。大陈氏说，曼殊真正的母亲并不是河合，而是一个叫若子的日本少女。据说曼殊出生不久，她便离开了苏家。关于她的别的情况几乎毫无所知。大陈氏又说，若子是杰生雇佣的女仆。曼殊一个早年同学^①有新的说法，以为若子可能是河合氏的侄女，当时和河合及杰生在一起，在苏家帮忙。这种说法倒解释了河合氏所意识到的对曼殊的亲缘关系和他对他的亲切感情。

不论苏曼殊血统的情况如何，这个男孩总是在横滨的杰生家里由河合氏抚养长大的，应该像曼殊自己认为的那样，把她看作是曼殊的母亲，至少也是养母。河合氏和曼殊是在 1889 年离别的，那时孩子六岁，随着黄氏回到香山苏家，在父亲的亲属中间成长，像煦亭以前的情形一样。三年后的 1892 年，苏杰生因茶叶生

^①即陈国权，和曼殊在横滨大同学校同学，他的日本母亲和河合氏的一个好友关系密切。他曾参加 1907 年曼殊和河合氏的聚晤。1966 年 2 月，在横滨任职的原大同学校学生罗孝明到香港访问陈国权时，陈谈了这个情况。这一点，以及曼殊早年在日本生活的其他情况，我是因罗孝明提供的材料才知道的。

意失败^①，带着两个中国妾同返家乡。河合氏留在横滨。有一种说法是，杰生在离开日本之前已经和河合氏断绝了关系。不论情况如何，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杰生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过横滨，而河合也没有再去过香山苏家。苏煦亭在 1895 年到日本表叔林北泉处学做生意时，河合氏和他好像有过一些通信联系。曼殊本人直到二十四岁才和河合氏重新取得联系。河合氏那时年正六十，已经嫁给一个上了年纪的日本商人。曼殊对她的再嫁似乎没有采取不友好的态度；另一方面，这件事可能结束了煦亭和她的关系。对曼殊来说，河合氏始终是一个赋有伟大母爱和高尚品德的妇女，并且在他以后十一年的生活中，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但是，曼殊和他父亲的关系并不亲密。在日本同住了最初几年之后，从 1892 到 1895 年，他们父子仍一起在香港生活，其后一年半，又同在上海。从此以后，父亲和儿子就各走各的路了，没有迹象说明他们曾经再见过面。曼殊和家庭疏远的原因不明。甚至他 1904 年在香港听说父亲生病时，都拒绝回家探望；同

^①按另一种说法，苏杰生是因中日战争在 1894 年离开日本的。参看亨利·麦克阿里弗：《苏曼殊——一个中日混血的天才作家》（伦敦，1960）第 2 页。

一年，他也没有参加父亲的葬礼。

苏曼殊从 1889 到 1896 年在香山度过了七年的童年生活。虽然这在他一生中是一段较长的时期，但对他的传记作者们说来，这几年仍然是个空白。可以猜想，他那时享有众多的兄弟姊妹以及堂兄弟姊妹们的友谊。他七岁初次上学时，开始学习当时通用的中国古文的基础功课。他从讲日本话改为讲广东话并没有什么困难，因为他在横滨时家中一定也讲广东话。在香山，除了 1892 年他父亲带着两个妾从日本回来，及以后在 1895 年带着大陈氏动身去上海这些家事之外，就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事情在曼殊的生活里留下痕迹。中日战争(1894—1895)在这个遥远的南方村子的日常生活中本来不会引起多大激动，但苏家的人因为和日本有商业关系，他们可能比其他乡下人更注意这场冲突。加之，那时的学校常常是培养爱国主义和革命主义思想的温床，可以推想到，正当十一岁这种敏感年龄的曼殊，和任何地方的学生们一样，对中国被日本打败的耻辱，也会感觉愤恨。很快，曼殊本人就卷入了激动大城市里青年人的政治漩涡和知识潮流中了。

他 1896 年离开家乡，去到在上海的父亲那里。迎接这个从香山来的农村少年的，是五光十色的大都市生活景象。自从 1842 年开放为通商口岸以来，这个庞

大的商业城市已经发展繁荣起来了。从 1896 年到他去世的 1918 年，在将近四分之一世纪内，上海是他常到的很熟悉的地方，这个城市以各种鲜明的对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它的欢乐和痛苦，它的极度贫穷和巨大财富，它的高楼大厦和多家合住的贫民窟，还有它的宽广的马路和拥塞狭窄的小巷。它是一个有着许多生活乐趣的城市，诸如音乐、戏剧和其他各种美好的艺术 另一方面，讨饭、赌博、卖淫和抽鸦片这些社会的病毒，又使它糜烂不堪。不过，对一个新到的旅客来说，大都市生活中的丑恶和污垢，常常被一种耀眼的、堂皇的外表掩盖着。

上海的欢乐、繁忙景象，可能使曼殊回想起在他记忆中渐渐淡忘的横滨。然而，在这两个城市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上海的巨大财富，不公平地为西方人所控制。他们发现上海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他们可以在那里积聚财富，并耽迷于种种生活乐趣。在外国租界里，可以看到宽敞的住宅区、宏伟的银行、高大的百货公司，以及那些绿树成行的林荫道和有绿色草坪的幽美的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但是，尽管有这些限制和不平等，厌战的和挨饿的中国人，为了安全和谋生，还是从附近的城镇和农村成群结队地拥进上海。对他们来说，这个城市提供了一种和平与秩序的外貌，

和一个勉强维持生活的机会。与此同时，许多眼光远大的青年人，从内地集中到上海，在数目众多的学校里，其中有些是教会学校，寻求现代教育，他们在那里能学到第一手的科学技术知识、新的政治思想和经济理论，以及英语、法语和日语等外国语言。因此，上海不仅以外国企业和商业的大本营，而且也以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革命抱负和革命活动的中心闻名于世。

在这个充满奇怪、矛盾的城市里，曼殊发现了自己的才能。后来，他在中日两国间频繁的往来中，把上海作为他的旅行基地。他在那里开始结识了那些对他的一生有极大影响的文人，他为上海的报纸写了有鼓动性的政论文章，而在另一些时候，却又参加吃花酒，和妓女们混在一起。他生活中的这些插曲将在后面再叙述。当初，他像许多迁居到这个英国控制下的通商口岸的人一样，在上海首先要做的事是学习英语。

苏杰生在 1897 年 4 月被召回家乡去侍候生病的父亲，半年后老人家就死去了。大陈氏随丈夫一起回去，而曼殊仍留在姑母和姑父家，直到第二年。1898 年他十五岁时，随林北泉的侄子、他的表兄林紫垣回到了日本横滨。他在那里遇见了煦亭，那时他的长兄已是二十余岁的青年，被父亲选中继承家业，正在日本学做茶叶生意。幸好家里对曼殊的安排有所不同。他得到

了爱正式教育的机会。也许是苏家对现代教育发生了兴趣，就把曼殊送进了大同学校，这是横滨华侨界为了教育青年一代新近开办的一所私立学校。

“大同”从《礼运》篇得名，是一个“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起这个校名的是一位著名的广东知识分子康有为（1858—1927），当时他住在上海，作为一个儒家学者和政论作家，声望正达到顶点。当横滨这所中国学校的创办人去找他请求帮助时，他不仅给学校起了名字，还推荐了他的四个信徒去作教师，其中一个当了校长。大同学校是教授中、英文的预科学校，十多年后它已经发展为教授从幼儿园到中学全部课程的学校。不过，它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它不仅要应付紧迫的经费问题以及横滨其他中国学校的竞争，而且还面临着因康有为在 1898 年那次昙花一现的维新运动中担任的角色而引起的紧张政治局面。

就是那一年，康有为和他的追随者梁启超（1873—1929）以及其他一些人，作为年轻的光绪皇帝的顾问和心腹到了北京。光绪为了谋求挽救王朝的崩溃，着手推行一系列的变法方案。在 1898 年夏季的一百天期间，连续颁布了一系列命令，在政府中进行重大改革。这些被认为是极端激进和危险的措施，吓坏了朝廷中守旧的官员们，他们在慈禧太后领导下重新纠集起来。

在此之前，她已经放弃了她在光绪未成年时执掌了几乎二十年之久的政权。后来在一次武力政变中，西太后恢复了她的统治，囚禁了皇帝，处死了许多维新党人，康、梁好不容易才脱身逃往日本。

横滨的华侨社团受到了这次政治事件的影响。一些社团的首领在中国外交官员唆使下，企图破坏大同学校，这些官员认为这个学校是一个滋长维新思想的温床。1902年，大同学校的危机达到紧急关头，一帮雇来的暴徒闯进校园，破坏学校财产。接着是打官司，学校被指控不付房租，在这紧急关头负责使大同学校免遭灾难的人，正是曼殊的表哥林紫垣，当时他是学校的董事之一。

直到1902年离开横滨去东京时为止，曼殊在大同学校共学习了四年。对一个新创办的私立学校来说，这个学校里的教员是相当优秀的。在中国教师中有四个是康有为的弟子，其中包括学校的校长徐君勉（徐勤）。当时教中国古典哲学的是卢湘甫，1965年时，他已九十七岁高龄，仍住在香港。英文由香港皇后学院的毕业生们教授。还有几个日本教员，其中有一个教军事学，估计曼殊一定会去听这门课程。大同学校的学生们组织过一个名叫“黄龙”的垒球队，曼殊有几个朋友参加了这个球队，曼殊本人没有参加

大同学校里充满了保守的孔子思想和热烈的爱国主义气氛。在康有为弟子们的指挥下，每个星期天都要礼拜孔子，学生们必须在孔圣人像前面跪拜，拒绝这样做的，就要受惩罚，被开除出校。但另一方面，学生们也受到民族精神和民族性观念的谆谆教诲。每天下课后，学生们都要唱下面的歌：

“国耻未雪，
民生多艰，
每饭不忘，
勸哉小子！”^①

这种爱国主义感情一定深深地影响了曼殊。他的一个同班同学曾回想起，曼殊时常谈到一句名言：“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传说这是东汉末年一位杰出的士大夫的母亲说的话，这位士大夫当时因为对有权势的宦官集团作斗争，死于狱中。

曼殊这个时期的另一个同学是冯自由（1881—1958），他后来获得中国革命史学家的声誉。他的父亲冯镜如，是横滨一家文具店的老板，也是大同学校创办人之一。孙中山在广州发动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后

^① 见冯自由：《横滨的大同学校》（《革命逸史》，中华书局 1980 年版初集第 61 页）。

逃往日本，他和他的同志陈少白（1869—1934）在冯镜如家里受到了欢迎。同年，冯镜如就组织并领导了孙中山 1894 年在檀香山建立的革命政党兴中会的横滨分会。当时冯自由还是一个十四岁的少年，就参加了这个团体，成为最年轻的会员。从此以后，直到 1925 年孙中山逝世，他一直是孙中山信任的助手之一。冯自由作为党的组织者和报纸编辑，在香港、温哥华、旧金山进行活动，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并不小于孙中山的其他许多追随者，但是那些人后来在国民党政府里都身居要职，而冯自由因反对与苏俄联合的政策，失去了孙中山的好感。不知什么原因，他在蒋介石的反共政权中也未能东山再起。冯自由退出政治舞台之后，就在他的后半生中，专心致志地大量写作他所熟悉的、并亲身参加的 1912 年以前反清革命运动的历史。

在冯自由的各种历史著作中，可以找到他对大同学校生活的个人回忆，以及对他和他的同学苏曼殊早年交往的回忆。据说，曼殊先在仅授中文的乙级学了两年，然后又升到兼授中、英文的甲级。那时，冯自由已经去东京，进了梁启超创办的高等大同学校，后来又入早稻田大学读书。多年以后，他回想起，虽然课程并不难，曼殊也只是一个成绩平常的学生，而且他把曼殊形容成一个相当迟钝、平庸的人。另一个同班同学的

说法却与此不同，他最近说，曼殊是被特许上梁后超任教的中文高等专修夜班的五、六人中的一个。有可能，曼殊因在沥溪乡塾读书和在上海散漫的学习，基础差，所以起步比别人晚，但他在大同学校学习的几年里取得了优异进步。而另一方面，冯自由对曼殊的绘画才能却有深刻印象，这种才能赢得了同学们的赞赏。

当林紫垣在 1902 年与大同学校突然发生的危机搏斗时，他将曼殊送到东京学习，和他的堂兄苏维翰在一起。虽然他们不在一个学校读书，维翰入高等师范，曼殊在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班学习，但他们堂兄弟俩在东京时保持着密切联系。当曼殊在第二年回中国时，维翰是给他送行的极少数友好之一。

第二章 从年轻的革命志士到佛教徒

二十世纪头十年中，中国的反清风潮达到了顶点。上世纪最初播下的革命种子，在中国本土到处都生长起来，在有华侨社会的外国土地上也开始萌芽。在国内外交受了激进的社会政治思想的青年学生，成为革命的先锋。这些年轻人屡遭失败，无所畏惧。他们在孙中山领导下，为了恢复汉族统治，不惜付出一切代价。跟日本及西方国家的接触，在他们心里唤起了一种新的民族精神，与以前激起义和团采取极端行动的那种狂热而又盲目的爱国主义不同。这些新的领袖们为了建立一支比较坚强有力的政治队伍，就在国外或在国内租界地区为清政府的势力所不及的城市设立总部。因此，只要叙述一下东京、上海和香港的情形，就可以说明二十世纪初年中国革命活动的概况。曼殊在这三个城市都短暂地逗留过，在这些城市里，他都厕身于革命

队伍的行列之中。

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界，苏曼殊作为一个年轻的，没有经验的革命志士开始进行锻炼。1895年，中日战争结束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人数还很少，到了1906年，大概已经增加到整整一万三千人。人数最多的一批来自曼殊的家乡广东省，其他许多人来自长江流域的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等省。他们到日本寻求现代教育，却往往成为热情的革命志士。尽管他们的经历和性格各不相同，但大家都有共同的抱负，要把中国从清朝统治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并且有些人下定决心，一旦推翻了清王朝，还要改革传统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中国留学生界在政治观点方面表现出很大分歧，那些具有坚强革命理想的人们，构成了最活跃、最有发言权和最敢作敢为的一派。他们年轻、热情，言语和行动都很勇敢。他们组织各种政党和团体，来宣传自己的信仰，并为他们的活动提供一个中心点。不少的学生既有革命热情，又有文学才能，他们创办期刊来阐明自己的观点。曼殊在东京的学生时代结交的正是这些激进分子。

在他们中间，湖南人秦力山，是一个年轻的煽动家，他曾在康有为的两个门徒梁启超、唐才常主持的长沙时务学堂读过书。他后来响应梁启超的号召，出国

到东京进大同高等学校学习，和冯自由同学，苏曼殊后来也进了这个学校。1900年义和团起义时，秦力山前往天津，劝说义和团领袖们放弃消灭外国侨民的计划，并且接受反清革命的纲领。他没有完成这次使命，却被义和团的人们当作“二毛子”撵走了。接着，他又到汉口和唐才常联络。唐才常当时正在组织一支长江流域各省的自立军，准备在华中夺取政权。结果起义失败，唐才常和他的几个部下都牺牲了，其中有的是大同学校的学生。秦力山当时正在安徽策划一次海军兵变，因此立即逃往日本。他在日本成为革命阵营的一个坚定分子，不再支持康有为所提倡的君主立宪，转而赞成孙中山的革命政策。于是，他就试图和章太炎共同组织一次中国留日学生的集会，纪念支那亡国 242 周年。

在这群人中，最活跃的人物或许是章炳麟（1868—1936），当时他这个名字要比“章太炎”更为人所熟悉，他后来成为苏曼殊的朋友。现今，章氏享有的国学家的名声，已远远超过他早年从事的革命活动。章炳麟当时是唐才常发起在上海张园召集的“国会”的成员之一。不过，他反对唐派的君主制的宗旨。由于意见不受重视，他就剪掉辫子，表示对清政权的反抗。当唐才常在汉口的军事行动失败后，章炳麟就到美国教会创办的苏州东吴大学教授汉语。在那里，这位政治上的

活跃分子继续发表对革命事业的直言不讳的主张，关于这个情况的报告，很快就送到南京的清朝政府。为了避免被逮捕，他在 1902 年初离开苏州前往日本。到达日本不久，他便和秦力山一起到横滨去访问孙中山。他在自传中说，他受到孙中山很好的接待，并且一起步行到中和堂去听军乐演奏。孙中山的信徒一百多人又设宴欢迎他，这件事确定了这两个人之间友谊的结合。

1902 年 4 月上中旬，章炳麟想出一个主意，提议举行前面所说的学生集会来激起和增强旅日华侨的爱国主义感情。章炳麟本人用典雅的文言文起草了宣言。其中有一段，在叙述了满清进行征服时对中国人民的屠杀及对中国城市的蹂躏之后，他写道：“端冕沦为辮发，坐论易以长髭。葺兹犬羊，安宅是处，哀我汉民，宜台宜隶，鞭撻之不免，而欲参与政权，小丑之不制，而期捍御晰族，不亦忸乎？”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全都收到了这个宣言，有几百个学生准备参加集会。但在中国驻日公使的请求下，这次集会日本警方查禁，只有孙中山的少数同志在横滨的一家饭馆里进行了纪念。

然而，年轻的革命志士们的精神是无所畏惧的。为了在共同的事业中结合在一起，他们在 1902 年冬天成立了“青年会”这显然是受了玛志尼的“少年意大利”的启发，但是为了不过分引起公众的注意，他们的组织